

刘运峰 编

鲁迅先生纪念集补遗

鲁迅先生纪念集补遗

第一辑

周夫人述悲怀

鲁迅除有爱人许景宋女士及一子随同在沪外，北平西三条二十一号寓所，尚有其八十余岁老母，及妻朱女士。此处周家已寄寓十余年，鲁迅生前在平时，即寓于斯。记者于辞别周作人后，即往访其夫人，其寓所为一小四合房，记者投刺后，即承朱女士延入当年鲁迅之书斋接见，室中环列书箱书橱甚多，东壁悬鲁迅速写像一帧，陈设朴素。朱女士年已届五十八岁，老态龙钟，发髻已结白绳，眼泪盈眶，哀痛之情流露无遗。记者略事寒暄后，朱女士即操绍兴语谈前两周尚接其（即指鲁迅）由沪来信，索取书籍，并谓近来身体渐趋痊愈，热度亦退，已停止注射，前四日又来信谓体气益好，不料吾人正欣慰间，今晨突接噩耗，万分悲痛，本人本拟即日南下奔丧，但因阿姑年逾八旬，残年风烛，聆此消息，当更伤心，扶持之役，责无旁贷，事实上又难成行，真使人莫知所措也。记者以朱女士伤感过度，精神不佳，不敢过事长谈，遂即告辞。

（1936年10月20日北平《世界日报》）

周作人谈往事

〔特讯〕中国现代文坛巨子鲁迅，已于昨晨五时二十五分在上海寓所逝世矣。鲁迅原名周树人，为中国文学界之权威者，中外文学界闻耗后，均震悼不已。其一切身后事宜，均由其三弟周建人（现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料理。其二弟北大教授周作人，及老母与其夫人朱女士，现寓北平，得讯后，皆悲戚万端。记者曾分往访问，兹将所得详情，志之如次：

记者首访周作人于苦雨斋，经述来意后，周即戚然谓：诚然先兄逝世消息，余于今晨八时许已接三弟建人电告矣。电中并嘱老母年事已高，最好不使之闻悉，余接电后，因往商同乡宋琳君（宋现任北平图书馆会计），以凶信终难隐瞒，遂托宋持电往告，老母闻此噩耗私衷之悲痛可知也。嗣周即述鲁迅之身世及其传略，据称：先兄于一八八一年生于浙江绍兴原籍，名树人，享年五十六岁，十八岁至南京投考水师学堂后，又改入陆军学堂附设之路矿班，毕业后派赴日本留学，时为一九〇三年，与名画家陈师曾同轮东渡，抵东京后，未继续研习路矿工程，首入宏文学院，不久又转仙台医专（即今日本东北大学医科前身），未二年，因兴趣不同，返东京入独逸语协会学校，专攻德文，是为其决定放弃原有计划，悉心研究文学之起始。同时又学习俄文，当时同学者，有许寿裳，陶冶公，陈子英，罗黑芷，汪公权及本人等。是时太炎先生（即章炳麟）适在东京讲学，先兄及本人与钱玄同，钱家治，龚宝泉，朱宗莱诸人，每星期日亦请太炎先生在东京民报社内讲学。彼时先兄尚有出版杂志之计划，目的侧重改变国人思想，已定名为《新生》，并已搜集稿件，撰稿者除先兄及本人外，尚有胡仁源，及前北平市长袁良之兄袁文蕞等，后因胡、袁赴英留学，《新生》遂至流产。

最初著作 无人问津

一九〇九年余兄弟着手译俄国、芬兰、波兰等国小说集，先兄所译者多从德文本转译，当时蒋抑卮（现在银行界任事）赴日养痾，允出资印刷，共出二卷，第一卷印一千册，第二卷仅印五百册，因蒋在上海设有绸缎庄，遂将该书一小部分留存东京售卖外，其余携回上海托绸缎庄寄售，但售出甚少，嗣该铺不戒于火，书亦随毁，后留存东京之书，系托湘人开设之群益书店寄售，每卷亦仅售出十册，当时滞销情形，可想而知。至一九〇九年，先兄先返国，时为民国纪元前二年，与同乡朱女士结婚后，被聘充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学监，翌年全体教员与校长夏震武发生意见，遂辞职改任绍兴中学学监，辛亥革命后，复任师范学校校长。民国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蔡元培任教育部长，便在教育部任事，政府迁往北京后，亦随同北上，仍供职教育部，嗣并任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教授。民国十五年，张作霖将入北京之际，政府开列所谓过激教授及知识分子五十人名单，将予通缉，先兄亦为其中之一，不得不离开北京，由是而沪、闽、粤、江、浙等省，荡迹不定，近年息影沪滨，致力写作。先兄治学，首本注重旧籍，南行后，因环境关系，遂不能展其所长。最初致力搜集旧籍，如《太平御览》，逐条分类加以考据，但外间尚鲜知者。民初辑得绍兴过去之史实地志等材料甚多，用木板刊数十部名《会稽郡故书杂集》，在绍兴仅售出一部，其余赠送亲友及各图书馆，自己仅留一二部。民国八年回家接着北上，误书版为试版，遂被焚毁，至为可惜。又对古代文献极有兴趣，将唐代以前散佚小说汇集成篇，名曰《古小说钩沉》，凡四部：第一部为《汉书·艺文志》著录之书，第二部为《隋书·经籍志·小说类》著录之书，第三部为《新唐书·艺文志·小说类》著录之书，第四部为虽不见于史籍，而汉唐人却已引用者。当在北大讲学时，著有《中国小说史略》，凡二十八篇，述周秦至清末小说蜕变大概，此书本为北大讲义，后经增订改由北新书局出版，此书有日文译本，南下后虽未积极继续研究，但文学兴趣恐仍在此。又对汉碑及汉碑花纹拓片，亦搜集甚多，因印刷费甚巨，亦未出版。

处世悲观 批评苛刻

周氏述至此,用极感喟之语调续称:先兄对我国社会民族之观察,皆较深刻,故对一切事物易陷悲观,且一切批评恐较吾人为苛刻,彼所著之《阿Q正传》等篇即充满此种情调,此种处世态度对大家均无好感。近年在沪情形虽未得详知然,近阅其《鲁迅杂文集》,此书所集文字为去年至今年所写者,似仍未脱《阿Q正传》之态度,或为一般人所谓之安那其派者欤?周氏至此又述鲁迅写作小说之经过,谓彼开始写小说,系先写《狂人日记》,《阿Q正传》在前《晨报副刊》发表时,署名为“巴人”,当时颇有人疑系四川人蒲伯英所写者,但《阿Q正传》所述之阿Q确有其人,其余诸人,亦多实有其人,如闰土系指吾家所用之多年长工之子闰水。吾人幼时颇受乡人之气,阿Q传,正是此种事实之写照也。最后记者询周是否拟赴沪料理一切,据答现沪上已有建人料理后事,本人不再南下云云。

(1936年10月20日北平《世界日报》)

中国名作家鲁迅夫人访问记

介 夫

〔本报特写〕世界文豪高尔基甫将逝世，而接着中国文坛第一流作家鲁迅先生亦于十九日的晨五时半在上海他的寓所里也病故了。鲁迅的死不仅是文学界的损失，也是全世界文坛的损失。

昨天的早晨，没有风，秋阳照着这熙攘的街市，车马仍像往日那样的飞跑着，可是在这古城中，每个人的面孔都含着一种忧戚的面容在注视着报纸刊载着这种不幸的消息。当笔者走到了宫门口三条二十一号时，门前有许多的人在谈论着这不幸消息，因为过去他们不知道这伟大作家的家就是住在这里的啊。这院子倒并不怎么大，三间北屋住着鲁迅母亲和他的原配夫人，三间南屋那就是鲁迅昔日在平居住写作的屋子，四周的书柜里，装满了线装的书籍和一些中日文的书。昨天这里便自权作成了致祭的地方。在东边的墙壁上，挂着一张长约二尺，宽有一尺的画像，据说这是陶元庆于一九二六年鲁迅在平时给画的。面貌仍是那么清瘦的，前面一个长桌上摆着祭品，屋里充满了肃穆的气氛，使我沉默了有好久。鲁迅的夫人面貌也是清癯的很，看年纪已有半百开外了，穿着白鞋白袜，并用白带扎着腿，头上挽着一个小髻，也用白绳束着。

当笔者首先致了一番慰唁之辞后，她便流露着极其伤感的神色，说道：“周先生逝世情形，已志各报。关于北平家族的方面，现在并没有什么意见，因为上海有许多的友好，为他办理一切的，这里他的母亲已是八十岁了，总是需人服侍着，所以一时我也不能动身赴沪！”她是绍兴人，和周先生同县，民国二年结的婚，来到北平已有十四年之久了，和鲁迅有三年多没有见面，在他谈到这里时，恰巧他的令弟知堂老人也在这里，于是笔者为要知道一些有关鲁迅先生别的事情，便向他去探询一切。

据周作人先生谈：“鲁迅的死，在当日八时由他的弟弟建人（现任商务印书馆编辑）给这里打的电报，关于他生前的事情，因为他的个性偏强，所以少有人向他询问事情的，他在文学界中的批评如何，我不愿意说，外方人士比我认识着较甚清楚的。他生平的著作一共有十多本，他在上海的景况如何，我也是不如何清楚的。如今他死了，北平的文学界现有人拟为他举行追悼会，本人以他上海方面已有家眷，对于那里的景况如何，也不明了，故自有上海文学界和建人就近在那里为他主持，所以本人也不再去沪的了。”末后我们又谈到他得病的原因。他说：“鲁迅在教育部任佥事时身体很好，以后因写作用心过度，竟转成一种心脏病，今年春天原打算赴日移地治疗的，以后病有起色，乃打消计划。”谈及此笔者便辞出。

（1936年10月21日《北平晨报》）

鲁迅的母亲说“鲁迅是 气极了才骂人的”

宋 舒

上星期一天的下午到西三条看望太师母——鲁迅的母亲，她虽然整八十岁了，精神还很好。她两眼是红红的，但没有眼泪，虽然心里很难过，还装着笑脸来迎接我。我因为怕她伤心，只稍微谈了些大先生的事。她说：“大先生所以死得这样早，都是因为太劳苦，又好生气，他骂人虽然骂得很厉害，但是都是人家去惹他的。他在未写骂人的文章以前，自己已气得死去活来，所以他实在是气极了才骂人的。”太师母真不愧为鲁迅之母，在这样悲惨的情况下，能不哭，还是微笑着，真不是普通人能作到的。她真会说笑话，她给我糖吃，又说着她关于糖的笑话。她说：“前几天几乎老命断送了，我吃糖时不小心，一下子把糖滑在喉中，因为糖块头太大，既不能下去又不能咳出，一直过了半点钟，难化的糖才慢慢的化下了。这时候万一气是不顺，不就死了吗？死不要紧，大家若知道了太师母是因吃糖而死，这多么不好听。”这样一来正悲痛的太师母也笑了。我到客厅，向着大先生的像行了三鞠躬，忽然一阵心酸，眼泪也止不住了。七时才回家。见报上又有许多名人关于鲁迅的谈话，都说，什么鲁迅是中国伟大作家，什么佩服他的天才，连对鲁迅不满的钱玄同，也说些始终敬仰他的天才的官话。鲁迅曾对我说过：“现在的要人都专会说些风凉话。”大概现在的名人还是离不了这套吧！鲁迅还算运气，死在上海，有蔡、宋给他治丧，若在北平就糟了，谁理他。拉车夫说得好“管他娘的”，“死了一个人，嚷什么鸟！”

(1936年11月3日北平《民国学院院刊》第七期)

元旦忆感

景 宋

向来,我们无所谓元旦,也无所谓节日的。就是自己的生日,我们也不大想到庆祝,总是随随便便的度过了。

今天是一九三六年最末的一天,不知怎地我总觉得心里面有一件事情似的不痛快,无名的杂念随着一天的光阴起落着,好似风车的叶片,转了下去,随即又升腾起来。

现时耳边轰响着鞭炮断续的声音,旧的记忆刺激着我;往年,到这一天的末夜,他,人们所追怀的鲁迅先生在做什么?他在整理一年的日记,把它包藏起来。再,就是把朋友惠赠或自购的日历挂起来。之后,不做什么工作,在躺椅上休息着吸烟,于是鲁迅先生刻板地,简单地口头统计一下:“今年做了些什么呢?明年要做些什么呢?”几乎每年如此。待统计出那一年的工作成绩不多时,他是万分不自在的,如此将更增加他新年后不断工作的努力。他北京书斋兼卧室的小房间里,有一副自集《离骚》的对联:“望崦嵫而勿迫,恐鹓 之先鸣。”就是用作座右的箴言的一种提示了。

此刻,我来粗略地替鲁迅先生统计一下他一九三六年到十月为止的工作罢。这年出版的有:《故事新编》,《药用植物》,《死魂灵百图》,珂勒惠支的《版画选集》和《苏联版画集》。编校成书的有《海上述林》上下卷。编好的有《苏联作家七人集》,还有两本《且介亭杂文》收集好了。此外零星文章和在计划的工作,一时数不清的也不少。大约平均的计算,每个月可有一本书出版而强。而且这里面,在本年三月间他就生病了,一直没有好起来,中间暑天的时候,还大病至不能执笔。虽然如此,但从上面的工作看起来,在他十个月中,除掉了八个月的卧病的时间外,是不能相信一个人会做出这么些工作的。总会疑心是非人力之所能的罢!然而他,我亲自就看见他这样一丝不苟的脚踏实地的做着。

回念昔者，追想来兹，无怪我今天的情感压抑不下了。恐怕读者至此，也有同我一样的感想罢。

记得鲁迅先生讲起基洛夫说年轻人要希望看看将来。但他说：“我不是这样的，我是要战斗，到死才完了。但未死之前，且不管将来，先非扑死你不可。”

他对付敌人，对付自己的工作，都是拿这种精神贯彻了的。

因为要战斗，要工作，要多活几年，给恨他的人们不舒服些，所以平常他对于自己的身体并不是绝对轻视的。我们知道他从小有着胃病。有些医生断定他的肺病是在一直从前，二十多年前就有了的。还有些医生奇怪他的肺坏到这个样子，还能够做这许多的工作，活这么长的年限，以为一定有很巧妙的方法卫生的。其实，据他自己推测，大约一则以前生活小心，未曾生过大病；二则不肯随便糟蹋身体，如狂饮滥游之类的不规则生活。然而终于不治了。或者知道病入膏肓，无法挽救，索性在有限的光阴中，加紧工作，因而对工作和病体，都采取战斗式的罢。我时常替他到医生处取药，或因事外出，回来后，多晓得他曾偷偷地做工，而在我的预定回家时间前停止。使一面达到自己目的，一面免我责劝，这样的精神是可怕的，而且后来连病中预计的夜间休息也不大做得到，拿起笔来了。我说，你不是夜里不打算做事了吗？他说，做一些些。后来就连睡眠的时间也延迟了。一个战士的爱惜身躯，是如同爱惜子弹一样的，然而勇敢的战士当负伤时，却是仍然力疾起来，不惜最后的极力掷出手榴弹。

他晓得自己的性情和遭遇，同我谈话时曾经说道：“我其实是知识阶级分子中最末的一个，而又是最顽强的。我没有照着同阶层的人们的意志去做，反而时常向他们挑战，所以旧的知识分子如此恨我。”

话虽如此，那些同阶层的人们尽管恨他，骂他，同时因为他的不断努力的工作，博得了超乎名誉的社会信仰，在另一种场合里，就会有这样的事情：有一天，某大书局的要人做寿的征文信送来了之后，他感慨地说了：“我的社会关系太复杂了。比如这封信，看似很简单，而其实包含有我的地位，声望，和各方面的情况等等，才会有这样的信到来。这，是我积了多年的精力，物力，苦心所致的，所以即此一端，就看出我这个

人的社会关系太复杂了。”

是的,有些人们是恨他的;但有时,又忘不了他。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末夜十二时

(1937年1月15日《中流》第一卷第九期)

母 亲

许广平

有时一个人的脾气真奇怪：看见了别人家慈祥的母亲，心中会陡然发生一种被压迫似的感觉，难受到想找一个地方逃开，毫无感动地较为舒服些。这许是因为自己从小就没有了母亲的缘故罢。

这情形我碰着了多少次，尤其鲁迅先生的母亲，给了我极其深刻的印象。

一位乡下人出身的老太太，我们料想她一定很顽固的罢，其实倒不尽然！她是最能够接受新的环境的。在看不过家里晚辈的小脚，特先把自己的解放起来，作为提倡。不久她变成半天足了，而那晚辈的脚还是较她细小。后来看见女人们剪发了，虽然是七十高龄的老者，也毅然剪了下来。在夏季，人们多要穿白色鞋子了，这在顽固的老年人，是会看了不高兴的，记得我小的时候就眼见哥哥们不得允许。而这位老人家，暑天也穿白色鞋子了，头发并不很白，面孔是细致，白而圆圆的，戴起蓝眼镜，穿起玉蓝色旗袍，手撑蓝洋伞（她欢喜蓝颜色），脚登白色鞋，坐在人力车上，实在足够精神。所以偶然外出，人家总以为她是儿子的同辈呢。

她还有一点好处：就是从不迷信，脑里没有什么神鬼在作怪。一切都自然地生活，又从不唠叨，不多讲闲话，和年轻的最合得来，所以精神活泼而强健。

忽然觉得年轻人拿织针编东西有趣了，她也要学习。待预备好了一切，就从头学起，做得不好就拆掉，重新学过，一次又一次，日夜如此，坐下来也拿着织针，半夜睡醒也拿着织针。终于很复杂的花纹都给织出来了，衣服也能编成功了。七十岁的高龄，就如同十五六岁的小姑娘一样埋头苦学，始终不倦。儿子也佩服了。他说：“我的母亲如果年轻二三十年，也许要成为女英雄呢。”

她老人家，现时已经八十岁了。我们除了民国的二十多年，再上溯五十五年，她是生在前清咸丰时代，那时思想极端闭塞，女人整天关在家里，多不识字的。而这位好母亲，她凭了一点毅力，自修到能够看书，这多么够强韧。她的生活就从这里出发，使自己勃勃有生气，毫不沾染一些老太婆讨厌的神气，更没有一点冷酷不近人情的态度。

在“三一八”的前夜，因了学校的风波，我们有几个同学跑到平夙敬佩而思想比较革新的先生们之前，恳求主持正义。自然鲁迅先生也是其中的一位。因了同情被压迫者，许多先生起来和黑暗势力战斗了。正面迎来的章士钊，《现代评论》派陈源等背后靠着“三一八”的主凶“段执政”，更有外力做后盾，给新的势力大加压迫、围攻。所以那时的国民党员是作地下生活，一被发见，就有被捕之虞的。而同情的人，也一样的遭受敌视。这一派的势力深入到一部分的学校当局，所以反对学校，反对政府，就是“大逆不道”，随便可以枪杀。而被目为“学匪”，自然也并不是怎么舒服的。做了“学匪”的母亲，我们想：她一定痛恨那些“毛丫头”多生事端，或者会拿起“母权”出来，干涉儿子们的行动。

她不是这样的母亲。

她把旧式的日夜消遣的小说丢开，每天开始学习看报纸（直到现在，没有一天间断。遇着生病了，也要找人给她读报）。大清早起来，抢先把儿子——鲁迅先生——要看的报拿过来，戴起眼镜细看一通。这时最欢喜看见我们“毛丫头”的到来，得以详尽地从报纸各节过细研究、讨论。遇到不平之处，大有慷慨激昂，愿意骂倒一切之状。反而惹得儿子好笑起来了，说：“娘何必这样的气呢？”

老人家这时变成了二十多岁的青年似的焦急，等不到第二天的报纸，自己买起晚报来看了，必要时竟买好几份。看报之后，除了和有知识的人们打听国家大事，对不识字的，她也一点点慢慢地解释给她们听。可惜这一着大大地失败了。讲了半天，那些中年人漠视她的苦口婆心，敷衍了事。这足见年龄和思想并不一定是成为正比例的。而她的日常生活，因此也相当的烦闷。

看报之后，和现社会接触了，晓得小我和大我的关系。对于儿子的举动，就尤其了解。为了野狗们的凶横、疯狂，犯不着作无益的牺牲，终

于在她那一次病中被电召到京(那次经不起朋友们邀请,曾演讲了几次,立刻就有人造谣,说他负有某种使命北上,致引起当局注意。)之后,没能够再北上。她绝不叫他再归省一次,她一点自私的心思都没有,虽则衷心是希望时常见到她的爱子的。她了解儿子肩头的重任是一刻也休息不下来的,转而设法自己南下。我们自然万分的欢迎,然而终于没有能够实现。这失掉的机会,恐怕会使她现在想起来都增加不少的难受。

我们晓得有些老太婆是颇吝啬的,她却不然。她把自己不多的零用钱,时常拿给急需的人。别的什物也并不怎么珍视。有一回,忽然赠给邻居木匠的小孩一个带响声的“集团”风车。——北京新年,市上常有的,一条直干,两旁横搁着十多个并排的带小鼓的风车,所以我就给它起一个“集团风车”的名字。——那家人想了一种表示谢意的方法,特地高竖在墙头上,与众共赏。不料整天风车转动,推动十几个小鼓,蓬蓬乱敲,使得好静的儿子莫名其妙,这时做“娘”的也大窘了。

这种脾气,儿子也一样秉承下来。他欢喜分书给人,就是不认识的,有时信来了,他总千方百计给寄出去,在可能范围之内。而那第三代的小海婴,也遗传得一些。他时常把新得来的自己爱好的玩具奉送小朋友。保姆生怕受责骂,有时先解释说小孩子不懂事,东西都送把人。这时做父亲的总带笑说:“不要紧的,我记得我父亲早先一句话:‘要分给别人才好呢,我们要是专待人家分给倒不好了。’”这恐怕就是这一家人的人生哲学罢。

这回最疼爱的儿子死掉了,人家通知她,当时很镇静,不怎么哭,但之后不会走路了,寸步都需要扶持。她后来对人说:“我听到了这消息,我倒不哭。不过两腿发抖得厉害,所以简直不能独自举步了。”这慈祥的母亲和儿子一样强硬,但精神却被打击得太惨了。

她于是广求关于儿子死后的一切记载,尽其力之所能及,满满的堆了半床。甚至《作家》、《中流》都搜到披览。她对人家说:“有些人想遮瞒我,哪里瞒得住我,我会看书的。”是的,这就是知识者的她的不同之处了。

看到各方面人士对于儿子普遍的悼念,真诚的爱戴,老怀宽放了。

她自慰自解的说：“还好，这样子，儿子死得也不太冤枉。”

儿子是不赞成死后的一切纪念的，而这一着就给与亲爱的慈母一种莫大的安慰。这恐怕做儿子的也没有计及到的。

鲁迅先生说过：“女人有时候有母性，有时候有女儿性，没有妻性。妻性是不自然的。”看见了这位老母亲，或者会相信上面几句话所含的深远的意义罢。

(1937年3月25日上海《工作与学习丛刊》之二：《原野》)

鲁迅《病中通信》(九封)附记

许广平

信共九封,从一九三六年六月至九月。系就鲁迅先生大病后的通讯中择较有意义的,经广平再三要求,始许允诺抄录底稿的。其中通信标题如第四封,他就说:《复蔡斐君》,第五封:《答欧阳山》,第六封:《复杨霁云》,第七封:《复王冶秋》,第八封:《寄许季弗》,俱于信抄毕时,由先生亲口授之者。捧诵遗札,音容宛若,弥增凄怆耳。

曹白先生因有北方友人函询先生病状,特嘱我写些大概。先生得知了,就说,“那许多关系你写不好的,还是由我拟出罢。”结果是他起稿,用我名义抄录寄出。我以为这一封信可以算是先生自己对于病状的报告文字。当时信底写好之后,先生颇觉满足。就说:“如果你写起来,一二千字也写不到这样详尽呢。”我是除了承认之外,没有别的话好说。

先生自己作为文艺者的修养是很注意的。他的胸怀朗豁,对于无聊文字及与人言谈上稍涉及“无关大体的无聊事”,就往往设法避开。就是对于我有时因杂务忙碌,一时静不下来,随手翻阅一般刊物,也时常警告,说不如拿有用的光阴看别的有益著作。看他给时玳先生的信,深怕“令人变小”。这种管自己放开脚步前进的豪迈心情,多数不为人所了解。说他“气量小,一点点小事就和人争闹”,这徒然是说的人给自己写照,毫没有损到先生。有人说他把持文坛,事实上他日夕希望多些人出来,他从没有在文坛上扩大私人势力的念头。看他对《文艺工作者宣言》的解释,对《作家》的态度,就是一个有力的反驳。

先生夏间大病之后,就有些稿件寄来,嘱其阅看,介绍,或者约他会见接谈,执笔通信,像平常人一样。而病实在不容许他有这么多的精力,所以当收到这些信时,往往感情无既,太息的说:“他们当我还是青年,病两三天就立刻像好人一样。其实年纪大了,恢复是不会那么容